

797210

034-23

443

虎口余生

〔法〕约瑟夫·若福 著

-23

034-23

443

707219

239-23
46

虎口余生

(法)约瑟夫·若福 著
宋春晓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seph Joffe
UN SAC DE BILLES

J.-C. Lattès 1973年版

虎口余生

〔法〕约瑟夫·若福 著

宋春晓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0.125 插页 3 字数 181,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书号：10188-672 定价：1.50元

献给我的家

我的朋友、作家克罗德·克劳茨盛意重读了我的手稿并以他斯轮之手作了修改。在此我谨向他表示谢意。

序

本书不是历史学家的著作。

那是通过我十岁时童年岁月的回忆，叙述了占领时期我的经历。

三十年过去了。记忆中的某些细节由于淡忘会出差错。但是基本事实都体现在它的真实性、亲切感、幽默感和活生生的忧虑中。

为了不至于引起误解，书中出现的许多人的名字都不是原名。故事讲述了两个孩子在一个残杀和荒谬的世界里怎样一次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经过。

弹子在我伸在口袋里的手指间滚动着。

这颗是我最喜欢的，我总把它带在身上。最神奇的是因为它在所有弹子中最难看：这和吕蓬大爷开在拉梅街角上的小店里放的毫无相同之处，我喜欢看橱窗里摆着的玛瑙色的或涂上铅色的大弹子。我这一颗呈土色，彩釉斑驳，表面看上去高低错落，可以说：图纹是缩小的星座。

我挺中意它，把地球装在口袋里多有意思，高山、大海，一切都藏得好好的。

我是个巨人，身上带有全部星球。

“喂，妈的，你到底玩不玩？”

莫里斯坐在食品店前的过道上等着。他的袜子老绞成一团，爸爸叫他手风琴手。

他两腿中间摆着四颗弹子：一颗在上，三颗在下，堆成一个锥型。

爱帕斯坦大娘在店门台阶上，看着我们。这是个干瘪透了的保加利亚人，皱纹多得似乎都排不下了。她脸上出乎寻常地还保留着大草原的风吹成的紫铜色，在凹进去的店门口，她总坐在一张包藤的椅子上，成了连克里良古尔门上灰色天空也改变不了的一个巴尔干人活生生的典型。

她每天都在那儿，微笑着目送放学归来的孩子们。

传说她靠步行穿过了欧洲，为逃避沙皇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跑到巴黎十八区这个角落里安居下来。这里还居住着那些东方的流亡者：俄国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托洛茨基的幕僚，知识分子，手工艺者。她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虽然额上脸颊上颜色未变，但记忆力却不得不在衰退。

她笑咪咪地看着我身体左右摇摆着，手揉着和我衣服一样黑颜色的旧围腰。那时候所有小学生都穿黑衣服，全体儿童服丧，对一九四一年来说就象是个前兆。

“瞧你，我的老天，你怎么啦？”

的确，我老迟疑不决！而莫里斯打得漂亮极了，我打了七次都输给了他。眼睁睁看着他将赢得的弹子一颗接一颗装进衣袋，把口袋鼓得象个皮球，重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他装满了弹子，我则只剩下最后一颗，我的宝贝。

莫里斯咕哝着：“我可不在地上坐等到明天……”

我豁出去了。

捏在掌心的弹子微微颤抖着，我瞪大眼睛把它射了出去。又打偏了。

得，一了百了，奇迹没有发生。现在该回家了。

高尔登贝格猪肉店的建筑有种奇妙的风格，别人说它象装在一个玻璃缸里似的。马尔加代大街的石块高低参差。

我朝左边望着，因为莫里斯走在我右边，这样，他看不到我在哭。

“别哭鼻子了！”莫里斯说道。

“我没哭鼻子。”

“你头老转向一边我就知道你在掉眼泪。”

我用罩衫袖子蹭了一下，脸颊上的泪水擦干了，我再回嘴而是加快了步子。我们本该在半小时前到家的，现在要挨骂了。

我们到了：那儿就是克里良古尔门街，我家的店铺就在这条街，石墙上的字母又浓又大，字体漂亮得象是出自预备班女教师之手，有粗有细：《若福理发店》。

莫里斯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

“给，真没出息。”

我看着他，接过了他还给我的弹子。

这才象是做哥哥的，把刚从弟弟那儿赢去的最后一颗弹子又还给了弟弟。

我取回了我的那颗缩小的星球。明天我要靠它在学校顶篷下赢回一大堆来，我还要把莫里斯的也赢过来。别让他以为比我早出生那可恨的二十四个月就可以在我头上耀武扬威。

不管怎样我十岁了。

记得后来我们走进了理发厅，一股气味扑面而来。

每个儿童无疑都有他自己喜欢的气味。我童年喜欢的香味从薰衣草到紫罗兰应有尽有。直到今天我还看得到搁在架子上的香精瓶子，冒着白汽的毛巾，我还听得到推剪喀嚓喀嚓的声音，这些声音组成了我人生的第一首乐曲。

莫里斯和我两人进门时，正是最忙的当儿，所有的椅

子都坐满了人。迪瓦里埃象往常一样在过道上扯了下我的耳朵。不用说他又是到这理发厅来消磨时间的。他大概喜欢这里的装饰和同那些人谈天说地……这可以理解，年老鳏居，呆在西马尔街五层楼的三间套的屋子里总有点害怕，所以他就到街上，在犹太人家里度午后时光。他老爱坐在那个衣帽间边上的老位置上。等所有的顾客都走了，他才站起来坐到转椅上说：“轮到我的胡子了。”

总是爸爸给他修脸。爸爸会讲许多漂亮的故事，是这条街上的国王。爸爸后来死于焚尸炉。

我们做完了功课。那时我还没有表，但大概顶多用了四十五秒钟。我从来就在上课之前就把课文弄懂了。为了不让妈妈或哪个哥哥把我们赶回来做功课，我们还在屋里呆了一会儿，然后才溜出去。

阿尔贝正在一位长着一头鬃发的人边上忙着，汗流浹背地为了弄出一个美国式的发型来，不过他还是转过身来了，

“这么快就做完作业啦？”

爸爸也看到了我们，可趁他往柜子里放零钱的当儿我们一下子就溜到了大街上。

这是最愉快的时候。

一九四一年的克里良古尔门。

孩子们一个理想的角落。今天，那些建筑师们讲到的“儿童设施”总使我不解：在那些带沙坑的新楼群的新地区里，滑梯，秋千，到处是玩的花样。一切都是由那些专家（他们拥有三十万份儿童心理学结业证书）精心为孩子们设

计的。

然而他们却没有如愿以偿。孩子们仍然寂寞，无论星期天还是其他日子。

因而我想这些专家们是否问过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在巴黎的这个区里这样幸福。一个灰色的巴黎和它五光十色的商店，高耸的屋顶和顶上那一片天空，带台阶的垃圾箱挤满了人行道，可以避风躲雨的门廊，电铃，怪脾气的看门人，马车，卖花女，夏天开设的露天咖啡馆，无所不有。这一切一望无际，纵横交错的街道无穷无尽，象一座迷宫……我们前去探索发现。记得有一次，我在脚下发现了一条小河，它在一条肮脏大街的拐角上流过。当时我们感觉成了探险家。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乌克兰渠^①。我们注视着漂过去的草束和闪着油迹的斑斓的水面，直到夜幕降临还舍不得回去。

“我们回去吧？”

莫里斯问我。差不多每回主意都是他出的。

我刚想回答，眼睛却转向上面的大街。

我看见有人正走来。

应该说他们特别引人注目。

他们是两个，穿着黑衣服，高个子，扎着皮带。

他们的高筒靴大概一天擦到晚，所以油光铮亮。

莫里斯转过身来：

“党卫军。”他低声说道。

我们看着他们往前走着，速度不很快，步伐稳健，犹

^① 乌克兰渠：流经巴黎塞纳河的一条支流。

如走在一个号声嘹亮鼓声震天的广场上。

“你敢打赌他们会是来理发的吗？”

我没想到我们俩差不多同时有了这个念头。

我们趴在橱窗玻璃上象连体双胞胎，这时这两个德国人进了门。

我们不由笑了起来。

被我俩身体挡住的是店里贴在玻璃上的小广告，黄底黑字：

Yiiddish Gescheft①

在理发厅里，在沉闷的寂静中，不用说这种寂静在一家理发店里是从不曾出现过的，两个党卫军脱下帽子，并膝坐在犹太人中间，我的犹太父亲或我的犹太哥哥们给他们理发。

门外，我们这两个小犹太人可乐坏了。

① 意第绪语：犹太商店。

二

亨利掸去比比·科恩脖子上的头发。那人站了起来，朝柜台走去。莫里斯和我都想看个究竟，便跟了上去。

我心里一阵阵发慌：我们大概有点太过分了，居然把两个魔王引到犹太人集中的住宅区里来，胆子固然很大，但毕竟过分大了。

亨利转向德国人：

“请上座，先生。”

党卫军站了起来，坐到转椅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照着镜子，好象是在检验他的脸是否是一件乏味的，甚至有点让人反感的物品。

“要不要推得高一点？”

“可以，请将头路分在右边。”

我在留声机后边惊得目瞪口呆：一个讲法语的德国人！而且口音比我们这个区里许多人都讲得纯正。

我注视着他。他佩着一枝小手枪，枪套锃亮，口上露出一截枪管，就象我玩过的玩具。待会儿要是他知道是在什么地方，马上会把它拔出来，吼着把我们全杀死，甚至包括在楼上做饭的妈妈，她还不知道理发厅里有两个纳粹呢，

迪瓦里埃在角落里读着报纸。边上是我们的邻居克雷米厄，他在保险公司里工作，每月一次把他儿子带来剃头。我认识克雷米厄的儿子，他就在我们学校读书，课间休息我们一起玩。他呆着一动不动，个子本来就很小，现在恨不得还缩小一点。

我不记得当时还有谁了，大概全是熟人，但我记不清了，我越来越害怕了。

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阿尔贝在给他顾客分开的头路上抹油时说：

“战争不荒唐吗，嗯？”

党卫军微微一震。一个法国人问他话这大概还是第一次，他向上抖了抖，象是有了意外的收获。

“不，不荒唐……”

他们继续交谈着，别的人也参加了进来，气氛十分友好。德国人将谈话翻译给他那不懂法语的伙伴听，同时又听任亨利将他的头摆布着。千万不要在日尔曼人脸上划一道口子，现在这情形已够难捉摸的了。

我看到父亲专心致志地忙着，伸着舌头，待会儿就要挨揍的屁股已使我感到灼痛了，两个德国人不会注意到门，我可从阿尔贝膝前钻过去，莫里斯可往亨利的膝盖前过，但肯定要等到他们累到手不能干活为止。

“请您坐上来。”

第二个德国人的头由父亲理。

萨姆爱尔来了，我不顾害怕竟笑了起来。

他经常晚上到我家来道晚安，这样就成了我家常客。他

是个旧货商人，家离我们只有几百步路，专卖旧挂钟，可是他的货架上什么都有，我和莫里斯经常去那儿翻箱倒柜一番。

他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

“各位好！”

父亲手里拿着毛巾，一下子把它拧干了准备擦警卫军的脖子。

萨姆爱尔这才发现了制服。

他的眼睛瞪得比我的弹子还圆，而且还大三倍。

“哦……哦，”他说道，“哦……哦，哦……”

“噢，是啊，”阿尔贝说道，“大家正在忙！”

萨姆爱尔捻着他的胡子。

“不要紧，”他说，“待会儿人少了我再来！”

“好吧，向您太太表示歉意。”

萨姆爱尔依然站着不动，注视着这两名顾客，象聋了一样。

“好的，”他嗫嚅道：“好的。”

他还呆立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走掉了。

三十秒钟以后，从欧仁·苏大街到圣旺区的尽头，从犹太饭馆最里面到犹太人的瘦肉店后店堂，大家都知道若福老爹成了招揽德国国防军的理发师了。

划时代的事件。

理发厅里，谈话变得越来越亲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饶舌过。

党卫军从镜子里看到我俩伸着的脑袋。

“这是您的孩子吗？”

爸爸笑了一下。

“是的，两个淘气鬼。”

党卫军抬起了头，表情很是悲天悯人。在一九四一年，党卫军能同情犹太小孩简直太奇怪了。

“啊，”他说，“战争太可怕了，这都是犹太人的错。”

剪刀没有停下来，现在用推子了。

“您这样认为吗？”

德国人点了点头，带着坚定的口吻说：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爸爸最后在鬓角上推了两刀，象一个艺术家一样眯起一只眼睛。

手腕一动将围布撤去，镜子端了过来。

党卫军满意地笑了。

“很好，谢谢。”

他们走向柜台去付钱。

爸爸跟在后面去找零钱给他们。我紧紧靠在父亲身上，看见他脸抬得很高，堆满了微笑。

两个德国人重新戴上了帽子。

“不知你们是否满意你们的发型？”

“很好，太好了！”

“这个，”父亲说道，“在你们走之前，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所有到我这儿来的人都是犹太人。”

爸爸在年轻时曾演过戏，每当晚上给我们讲故事时，还模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动作。

在这瞬间，没有一个在舞台灯前的演员能比柜台后面的若福老爹更威严。

屋里的空气凝结了。克雷米厄第一个站了起来。他抓紧了也站了起来的儿子的的手，别的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迪瓦里埃一声不吭。他放下了报纸，收起了烟斗，接着是弗朗索瓦·迪瓦里埃——雅克·迪瓦里埃和若爱米玛施格兰的儿子，他在圣厄斯大希教堂受过洗礼，如今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也站了起来。我们全都站在那儿。

党卫军没有多说话。我觉得他的嘴唇一下子变薄了：

“我想说的是那些富裕的犹太人！”

零钱扔在柜台玻璃面上叮当作响，皮靴声远去了。

他们大概已经走到了这条街的尽头。我们还呆如木鸡地站着，许久不动。有过一瞬间我觉得我们象在某个童话里一样，被一个巫婆施了魔法，变成僵硬的石像再不能复生了。

魔法消除后，大家才慢慢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我知道打屁股这事算免了。

爸爸没有马上干活，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莫里斯和我的头，我赶紧闭上了眼睛为了不让我的哥哥说一天里看见我哭了两次。

“你们还没闹够吗？”

妈妈隔着板壁叱责着。

每天晚上，她都要来检验一下我们的牙齿、耳朵和指甲，在我耳朵上轻轻地打一下，给我们压好被子吻过我们才离开房间，象每天晚上一样，房门还没关，我的枕头就